

# 城乡流动人口家庭的 消费和收入：2008 ~ 2014 年<sup>\*</sup>

孟 昕 薛 森 薛进军

## 引 言

全球金融危机（GFC）的爆发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由出口导向型阶段向国内需求拉动型阶段过渡。2008 年末和 2009 年初，中国出口下降幅度超过 20%。这引发了中国政策制定者对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思考。近年来，中国经济逐步走向复苏，主要得益于政府在国内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刺激国内需求增长，中国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包括增加公共部门的工资收入，增加农业价格补贴，增加公共节假日以刺激旅游业发展，对农民购买的家用电器和汽车给予补贴，以及促进社会保险改革以减少预防性储蓄。到现在为止，中国仍然处于由出口导向型转变为国内需求导向型的经济增长的过渡阶段，而这一转型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家庭消费和储蓄的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家庭具有较高的储蓄率。大多数针对中国家庭储蓄的研究指出高储蓄率与中国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有关（Meng, 2003; Chamon et al., 2013; Choi et al., 2014）。改革以前，城市居民享有“从

---

\* 感谢 Bob Gregory 提出的建议，同时感谢向玉冰出色的助研工作。本章由孟昕在名古屋大学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中心访问过程中完成。孟昕对该中心提供的研究设施和环境表示由衷地感谢。

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改革逐渐侵蚀了公共服务和社会安全保障，使得城市家庭开始为自己的需求进行预防性储蓄。住房、教育、养老和医疗保险的改革都使得中国家庭在消费、储蓄决策上更有前瞻能力并且更加谨慎。因此，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家庭储蓄大幅增加（Meng, 2003；Cai et al., 2012；Chamon et al., 2013；Choi et al., 2014）。尽管教育改革影响了农村家庭，但是影响农村居民储蓄的主要因素是公共福利转变为家庭责任模式。例如，转变之前，农村地区的老年人由社区照顾，但社区提供的福利水平不高。在引入了家庭责任体系以后，社区提供的大多数社会福利消失了。此后，家庭需要为他们的生活进行储蓄（Cai et al., 2012）。在此基础上，竞争性婚姻市场是影响农村家庭储蓄动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重男轻女的观念导致中国性别比严重失衡。这一性别失衡现象在农村尤为严重，使得结婚成本大幅增加，并导致预防性储蓄动机产生（Wei and Zhang, 2011）。

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城乡流动人口已占城市劳动力的40%左右。但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针对中国城乡流动人口储蓄和消费行为的研究较少。本章将填补此空白。

总的来说，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比农村居民高，大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比小城市居民高。究其原因，一是城市居民收入较高，二是城市居民面临更多的消费选择，进而刺激了消费需求。“中国城乡流动人口”项目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城乡流动人口家庭的消费水平高于农村家庭（见图1），这一现象存在于消费的所有子分类中（见图2）。因此，从出口导向型向国内需求拉动型的经济模式转变的一个方式就是鼓励城乡人口流动，这一点对城市中缺少非技术性劳动力的经济组织尤为重要。目前，中国政府尚未完全意识到城乡流动人口和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间的密切联系。中国政府在鼓励农村劳动力移居大城市以及帮助流动人口永久定居城市方面的政策性措施仍较少。从2014年以来小城市城镇化战略的实施情况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政府对流动人口的重视程度。

本章将研究已实行的消费刺激政策对城乡流动人口的消费和储蓄行为是否产生影响，并探讨抑制城乡流动人口消费的潜在因素。

本章结构安排如下：首先，讨论当前针对人口流动的制度性约束以及这

些约束影响流动人口消费和储蓄行为的机制；其次，介绍本章使用的数据，并展示 2008 ~ 2014 年城乡流动人口消费和储蓄的基本情况；再次，研究流动人口的预防性储蓄行为的特点；最后，得出结论并提供一些政策性的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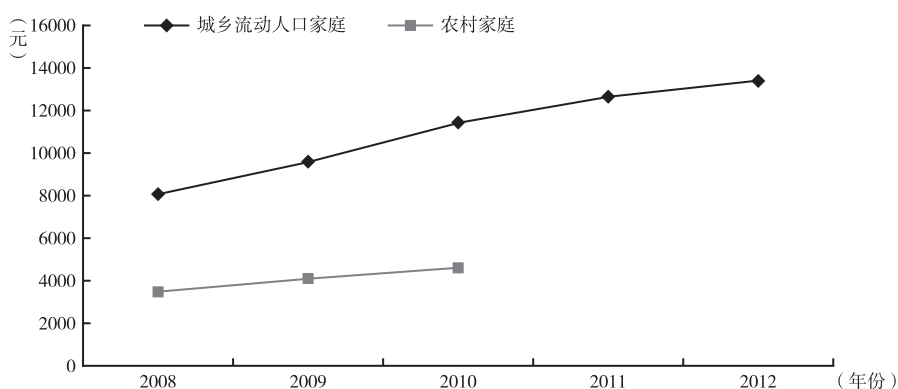


图1 每年人均支出的比较：农村家庭和城乡流动人口家庭

资料来源：“中国城乡流动人口”项目关于 2008 ~ 2012 年城乡流动人口家庭的调查，以及“中国城乡流动人口”项目关于 2008 ~ 2010 年关于农村家庭的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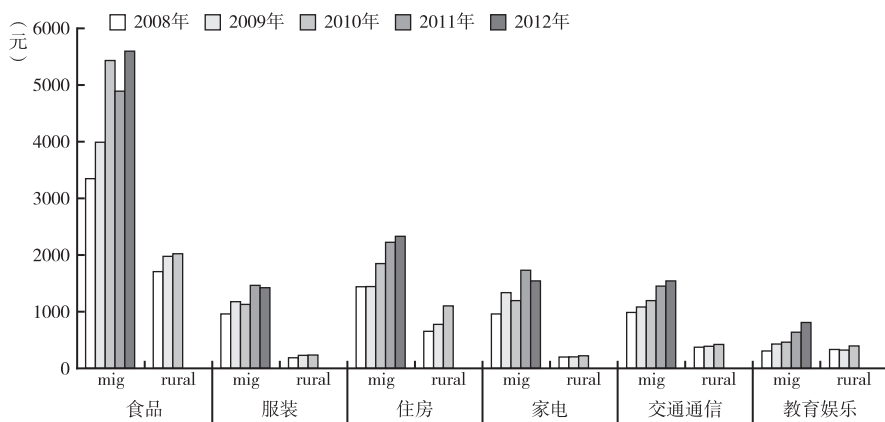


图2 各消费项目比较：农村家庭和城乡流动人口家庭

注：mig 表示城乡流动人口家庭；rural 表示农村家庭。

资料来源：“中国城乡流动人口”项目关于 2008 ~ 2012 年城乡流动人口家庭的调查，以及“中国城乡流动人口”项目关于 2008 ~ 2010 年关于农村家庭的调查。

## 背 景

中国城乡流动人口从总体上来说被看作“外来务工人员”。虽然他们对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他们在工作种类以及在打工城市所享受的社会服务（包括教育、医疗、失业保险和养老金等）方面受到限制。这些限制阻止了他们长期留在城市，也阻止了他们将家人带到城市中（Du et al., 2006）。不可避免地是，流动人口不会把他们工作的城市看作自己的家，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消费行为。因此，流动人口经常被认为是一个来到城市工作赚钱存钱，最终回老家过上更富足生活的群体，他们努力工作，花得少、存得多。

近些年来，中国中央政府意识到了“外来务工人员”这一体系的问题，并且引入了一些新的法律和规范来保护流动人口的利益，使其享受到更多的城市公共服务。但是这些消除对城乡流动人口歧视的做法收效甚微，这主要基于几点系统性的原因。以流动人口子女上学问题为例。虽然中央政府出台了一些将城乡流动人口的子女与城市本地的孩子同等对待的政策，并允许他们在城市的公立学校上学，但是这些孩子的教育资金是由当地政府提供的，而当地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为当地居民提供最好的服务，因此当地政府也不愿意尽力实施这些政策（Chen and Feng, 2013）。结果，大多数城乡流动人口将他们的学龄子女留在家乡。城乡流动人口在其他服务和社会福利保障方面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

总的来说，在过去的 8 年中，城乡流动人口所能享受的社会公共服务以及福利保障均有所改善，但改善的速度较慢。比如，2008 年，政府颁布了《劳动合同法》，明确要求所有雇主均要为外来务工劳动者支付社会保险。截至 2014 年，中国仅有 30% 的城乡流动人口拥有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不足 26% 的城乡流动人口拥有失业保险（见“中国城乡流动人口”项目的调查结果<sup>①</sup>）。考虑到“留守儿童”问题，2008 年，将近 60% 的 15 岁及以下

---

① 关于“中国城乡流动人口”项目调查的具体讨论，参见 Gong, X., Kong, S., Li S. and Meng, X. (2008), Rural-urban migrants: A driving force for growth, in L. Song and W. Woo (eds), *China's Dilemma*, Canberra: ANU E Press.

的儿童成为“留守儿童”；2014年这一比例下降至51%。也就是说，2014年仍有将近50%的15岁以下的儿童成了“留守儿童”。

在这些情况下，城乡流动人口的消费和储蓄行为与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均存在较大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作为“外来务工人员”，不能平等地与城市居民享有同样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最终无法融入城市社会造成的。

## 消费和储蓄的数据和总体趋势

本章研究的数据源于2008~2014年“中国城乡流动人口”项目调查。这一调查每年在9个省份的15个城市进行，包括广州、深圳、东莞、上海、无锡、南京、杭州和宁波等沿海城市，也包括成都、重庆、武汉、合肥、蚌埠、郑州和洛阳等内陆城市。“中国城乡流动人口”项目调查的抽样方式与其他关于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调查不同，后者主要根据家庭住址进行抽样。由于中国的内部迁移政策，很多城乡流动人口单独移居城市，并没有携带家属，他们很可能居住在工厂宿舍或是其他与工作单位相关的住宿地点。即使城乡流动人口与家人一起来到打工城市，城市住房的高昂租金也使他们无法在城市人口聚集的住宅区居住。因此，常用的城市家庭调查中的城乡流动人口样本很有可能是有偏差的。为了避免这种潜在的偏差，“中国城乡流动人口”项目在流动人口工作地点进行抽样。

“中国城乡流动人口”项目是一个面板数据，这一调查在不同年份追踪城乡流动人口。但是由于这部分人群比较年轻且流动性较高，调查样本流失率较高。尤其是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出口减少20%，并迫使许多城乡流动人口从打工地返回家乡，这使得当年的样本流失率高达63%。2009年以后样本流失率逐渐下降，从63%下降到2014年的35%。为了维持原有样本量，“中国城乡流动人口”项目每年都会重新进行随机抽样。因此，除了2008年以外，“中国城乡流动人口”项目调查每年都有两个子样本：一个子样本是前一年调查的追踪样本（“老住户样本”），另一个子样本是重新随机抽样产生的样本（“新住户样本”）。“新住户样本”对流动人口具有代表性，而“老住户样本”可以展示流动人口生活和工作的变迁（Meng, 2013）。

## 总体特征和分配的角度

本章首先研究城乡流动人口的收入、消费和储蓄模式在时间上的变化。所有的收入和支出变量都已经利用各省份城市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进行折算（2008 年价格指数看作 100）。本章依据城乡流动人口家庭的规模（即住在同一城市的相同住址的家庭成员数量）对收支变量进行调整，从而得出人均收入和支出。另外，沿袭以往文献的研究，本章剔除了样本中收入、支出和储蓄变量中最高和最低 1% 的样本。储蓄率由公式（1）来定义：

$$SR_i^1 = \frac{Inc_i - Cons_i}{Inc_i} \quad (1)$$

在这个等式中， $SR_i$  是住户  $i$  的储蓄率， $Inc_i$  是住户  $i$  的年收入， $Cons_i$  代表住户  $i$  的年消费支出。由于本章所研究的是城乡流动人口的特殊性质，因此也定义了另一个储蓄率变量：

$$SR_i^2 = \frac{Inc_i - Cons_i - Remit_i}{Inc_i} \quad (2)$$

在这个等式中， $Remit_i$  指的是流动人口住户的每年总汇款额。在数据中，流动人口住户的储蓄由四部分组成：投资储蓄（即证券、股票和房产的购买以及家庭生意的投资）、汇款、转移支付及其他非消费型支出、剩余储蓄。前三个部分组成了家庭非消费型支出，而最后一个部分是通过计算得出的，即由家庭总收入减去家庭总消费支出和非消费型支出之和得出。

表 1 展示了人均实际收入、消费支出、非消费型支出、汇款以及上文定义的两个储蓄率的统计数据。表 1 首先展示了总体的样本信息，剩下的部分报告了人均实际收入水平最高和最低 20% 的样本。在过去的七年中，高收入群体的人均实际收入平均每年上涨 8.5%，而低收入群体的增长率稍低，平均每年仅有 6.7%。平均来说，人均实际消费支出每年上涨 7.6%，但是在人均实际消费方面，低收入群体比高收入群体的增长率高，前者每年平均增长 9.7%，后者仅达 5.2%。总体来看，人均实际非消费型支出年均增长 4.7%，但是该增长主要发生在分配的顶端。在调查期间，人均实际收入较低的住户（排名后 20%）的非消费型支出年均实际下降 4.0%，而人均实

际收入较高的住户（排名前 20%）年均上涨了 7.5%。流动人口住户的汇款和非消费型支出的模式基本相同。从汇款量来看，高收入群体的汇款额比低收入群体高出 3~10 倍。表 1 的最后两列报告了两个储蓄率，一个包含汇款，另一个不包含汇款。2008~2014 年，平均  $SR_i$  保持在 36%~38%，但是不同收入组别之间储蓄率的差异较大。2008 年，收入在前 20% 的家庭的储蓄约占收入的 40%，2014 年储蓄率高达 50%。与高收入家庭不同的是，低收入群体的储蓄率却有所下降，从 2008 年的 27%，下降到 2014 年的 10%。如果排除汇款的因素，平均储蓄率则从 2008 年的 23% 上涨到了 2014 年的 26%。但是，平均储蓄率的增加主要是高收入群体造成的<sup>①</sup>。

接下来探究消费与储蓄在时间上的趋势。为了清晰地展现其随年份发生的变化，本章绘制了人均实际消费和储蓄的对数与人均实际收入对数的关系图。图 3 的 (a)、(b) 展示了人均实际消费、人均实际储蓄与人均实际收入（取对数）的无条件关系。这些曲线表明，2010~2011 年可能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前期（2008~2010 年）消费（或储蓄）和收入的关系曲线比后期（2011~2014 年）更陡峭。从高低收入两个群体的角度而言，两个时期消费、储蓄曲线的相交，说明了两个群体在两个时期中的消费、储蓄变化是相反的。

表 1 住户收入、消费和储蓄情况：全样本数据

指标	人均实际 收入(元)	人均实际 消费支出 (元)	人均实际 非消费型 支出(元)	人均实际 汇款(元)	储蓄率 (%)	不含 汇款的 储蓄率 (%)	观察 样本数 (个)
全部样本							
2008 年	16225	9838	3412	2266	37.0	22.8	4731
2009 年	18780	12172	3975	2819	33.0	19.2	4981
2010 年	20911	13505	3247	2071	33.4	23.8	5126
2011 年	24001	13292	3571	2361	38.5	29.2	4967
2012 年	24374	13834	3867	2659	37.7	27.3	4922
2013 年	27504	15697	5459	3723	36.4	24.3	4332
2014 年	29004	16471	4713	3463	36.1	25.6	4223
年均增长率(%)	8.7	7.6	4.7	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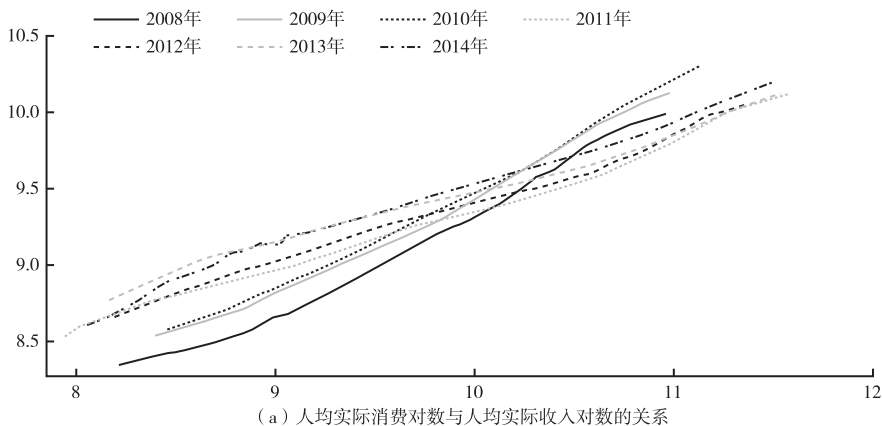
① 本章也用新住户样本的数据进行了统计与分析（见本章附表 1），结果与总样本的结论基本一致。

续表

指标	人均实际 收入(元)	人均实际 消费支出 (元)	人均实际 非消费型 支出(元)	人均实际 汇款(元)	储蓄率 (%)	不含 汇款的 储蓄率 (%)	观察 样本数 (个)
人均实际收入排名前 20% 群体							
2008 年	29218	16534	5476	3675	43.1	30.3	
2009 年	32694	20250	8194	5688	37.9	20.8	
2010 年	37100	23094	5602	3540	37.5	27.7	
2011 年	42769	20041	6403	4299	52.3	42.1	
2012 年	43547	20916	7155	4993	51.1	39.4	
2013 年	49668	23219	10914	7947	52.3	36.0	
2014 年	51753	23622	9090	7269	53.6	39.3	
年均增长率(%)	8.5	5.2	7.5	10.2			
人均实际收入排名后 20% 群体							
2008 年	7846	5596	2075	1105	26.8	13.0	
2009 年	9142	6938	1438	889	22.5	13.2	
2010 年	9659	7330	1454	735	22.8	15.4	
2011 年	10255	8395	1446	629	14.5	8.5	
2012 年	11115	9018	1889	948	16.0	7.2	
2013 年	12070	10427	1958	852	10.4	3.7	
2014 年	12362	10708	1554	756	10.2	4.4	
年均增长率(%)	6.7	9.7	-4.0	-5.3			

资料来源：“中国城乡流动人口”项目调查，2008~2014 年。

为了进一步解释这些变化，本章将高收入群体（收入排名前 20%）和低收入群体（收入排名后 20%）的消费收入对数和储蓄率的均值绘制成时间趋势图 [图 3（c）、（d）]。从图 3（c）、（d）可以看出，对高收入和低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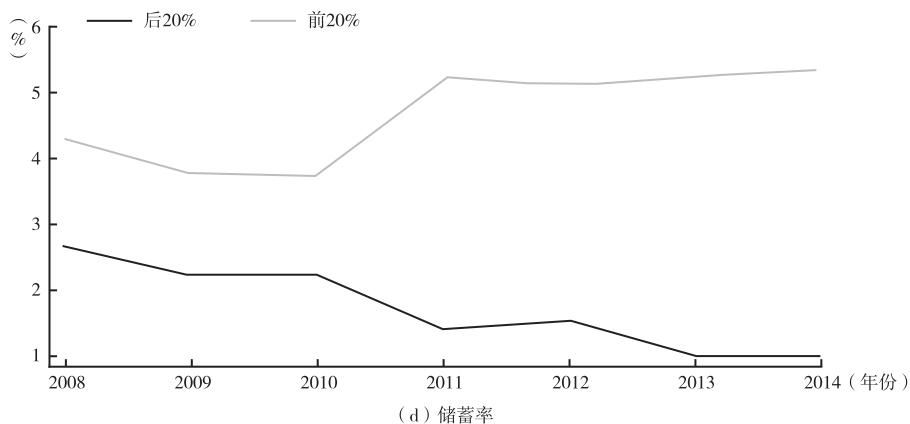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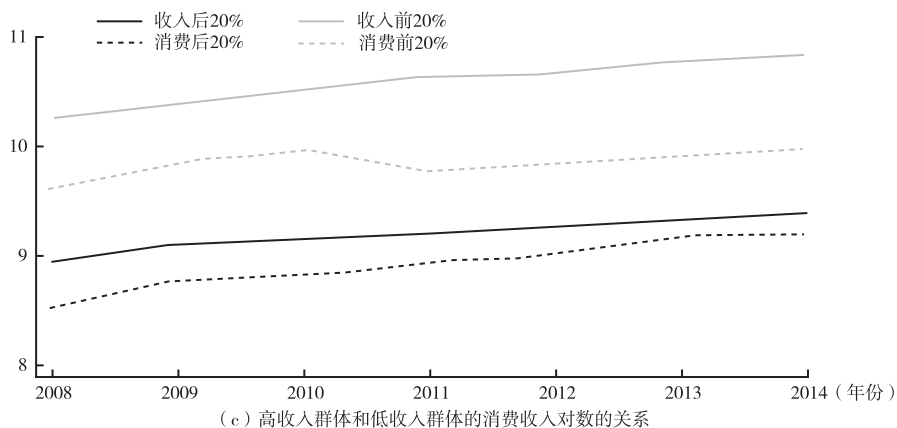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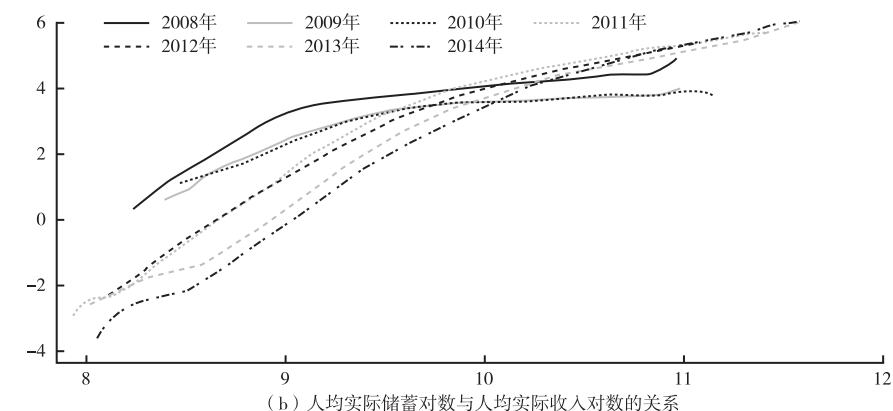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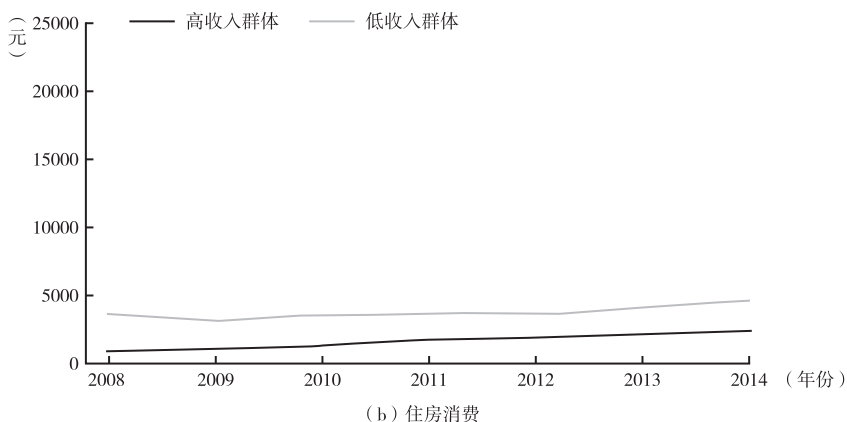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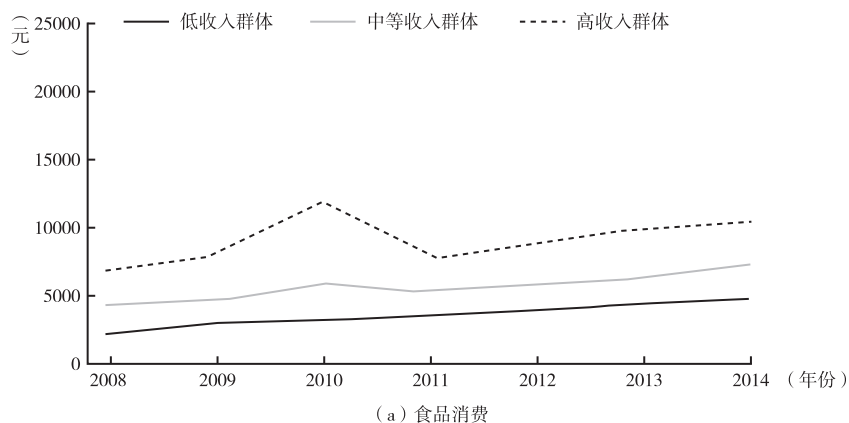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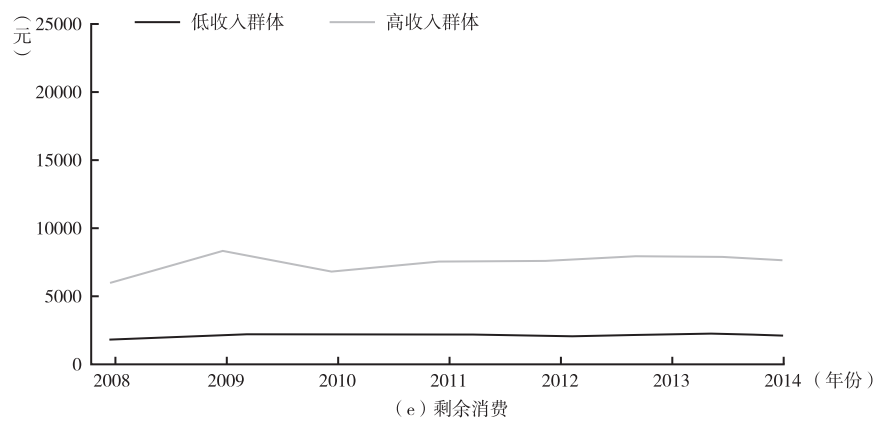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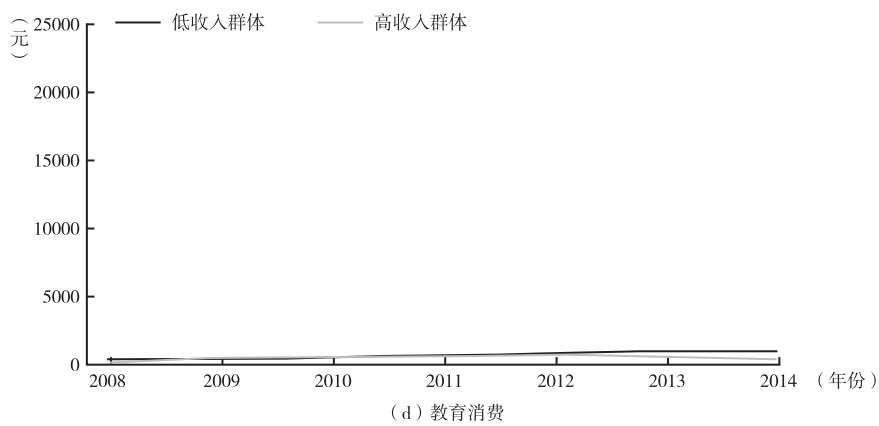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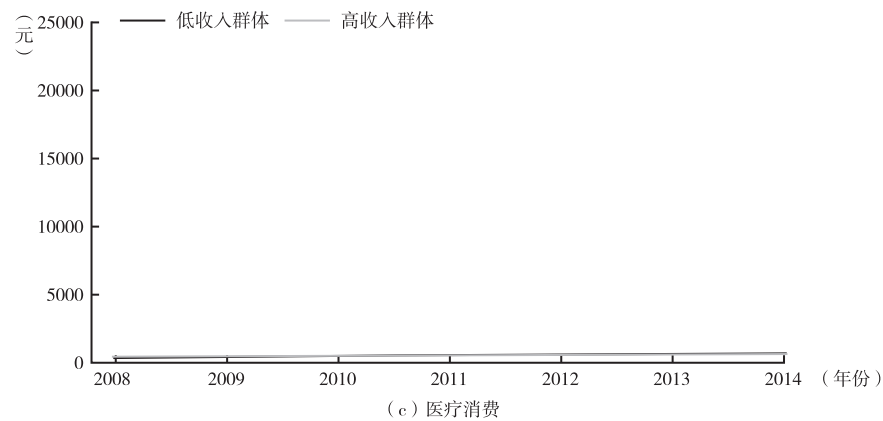
图3 2008~2014年住户消费、储蓄与收入的关系

资料来源：“中国城乡流动人口”项目关于城乡流动人口住户的调查，2008~2014年。

入群体而言，随着年份的推移，人均实际收入都呈现上升趋势，但是两个群体的实际消费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不同方向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区别发生于 2010 年和 2011 年，高收入群体（收入排名前 20%）的人均实际消费呈现出明显的下滑趋势。然而，低收入群体（收入排名后 20%）的人均实际消费则呈现持续上升态势，且调查后期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增长率高于收入增长率。这一区别可能是我们在图 3（a）、（b）中所观察到的结构性变化的原因之一。

接下来通过研究详细的消费和储蓄项目来识别引起结构性变化的主要消费项目。这些消费项目包括食品、医疗、教育、住房和其他消费支出。图 4 展示了收入最高和最低 20% 的家庭的分项消费水平。有一些基本问题值得我们注意。第一，食品消费是城乡流动人口工作者最重要的消费项目，这一项的消费是第二重要的项目消费——住房的两倍以上。第二，2010~2011 年消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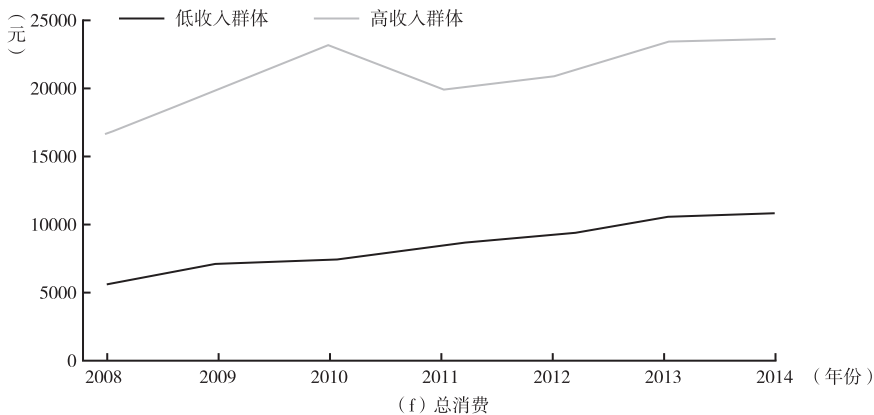


图 4 2008~2014 年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分项情况

注：图中低收入群体为人均实际收入排名前 20% 的家庭，高收入群体为人均实际收入排名后 20% 的家庭。下图同。

资料来源：“中国城乡流动人口”项目关于城乡流动人口住户的调查，2008~2014 年。

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似乎是高收入群体的食品消费情况发生了变化。为什么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本章研究了这一期间的总体的变化以及食品价格，发现 2010~2011 年食品价格剧烈上涨，其中肉类的价格变化幅度最大（见图 5）。肉类的价格虽然在 2010~2011 年上涨幅度巨大，但是在 2008~2010 年肉价出现很大的跌幅。在食品消费图即图 [4 (a)] 中观察到的食品消费变化趋势似乎与食品价格模式吻合。尤其是，可能会消费更多肉类食品的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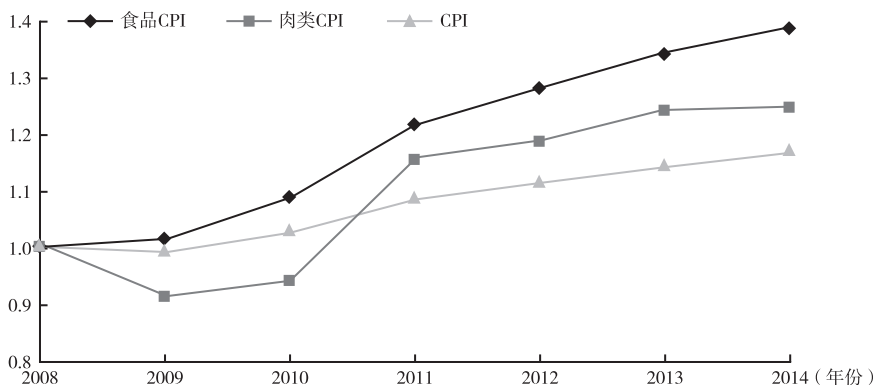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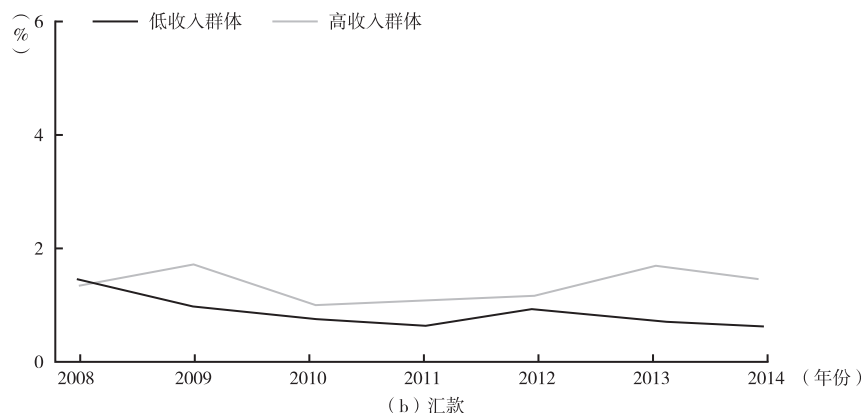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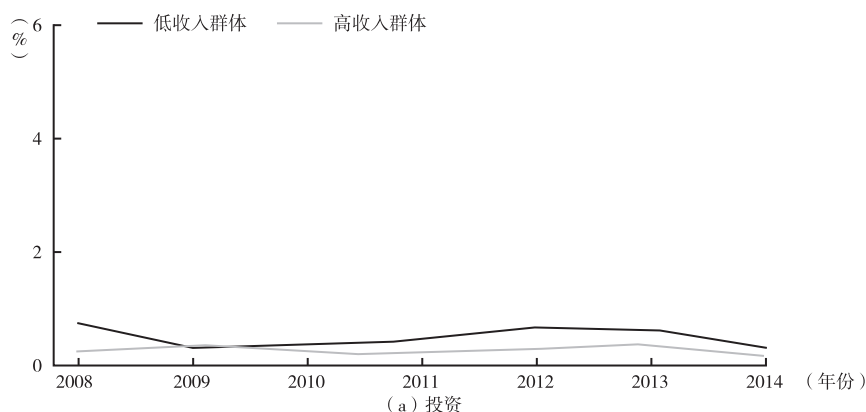
图 5 2008~2014 年价格指数

注：CPI = 消费者价格指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各年份）。

似乎受肉价变化影响最大，肉价下降时消费上涨、肉价上涨时消费下降。中等收入群体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影响，但是对肉类食品消费不太多的低收入群体受到肉价的影响最小。当肉价猛烈上涨以后，高收入群体开始用其他食物来替代肉类，导致这一群体总体食品消费水平下降。但是，对于贫穷者来说，他们可能平常吃的就是基本食物，因此不存在食品替代的问题，他们的食品消费水平在2010~2011年不会受到影响。2011年以后，食物和肉类的价格增加得更加缓慢，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所有收入群体的总体食品消费都增加了。

在研究储蓄率时，本章考虑了投资（股票市场、购房和生产相关的投资）、汇款、其他非消费型支出以及剩余储蓄（银行存款和持有现金的增量）。由图6可知，高收入城乡流动人口群体储蓄的增量并未带来投资的增加，也未引起其他非消费型支出的增加。虽然流动人口住户的汇款在调查期内略有增加，但是2014年汇款呈现下降态势。由此可见，高收入群体的储蓄增量中的大部分均变成了剩余储蓄，显示了高收入群体具有强烈的预防性动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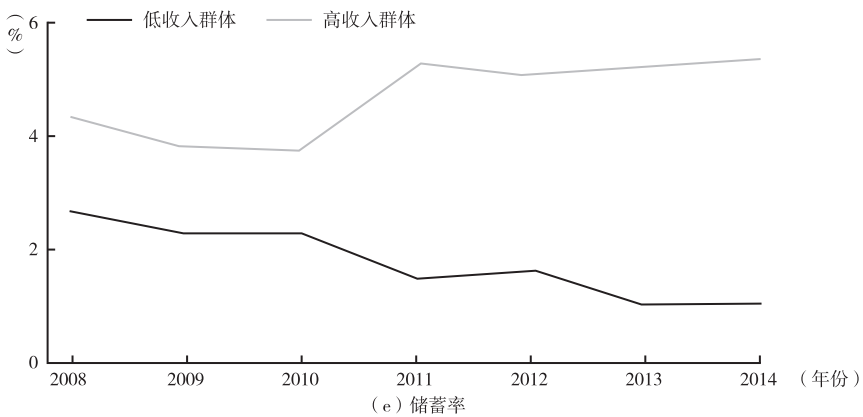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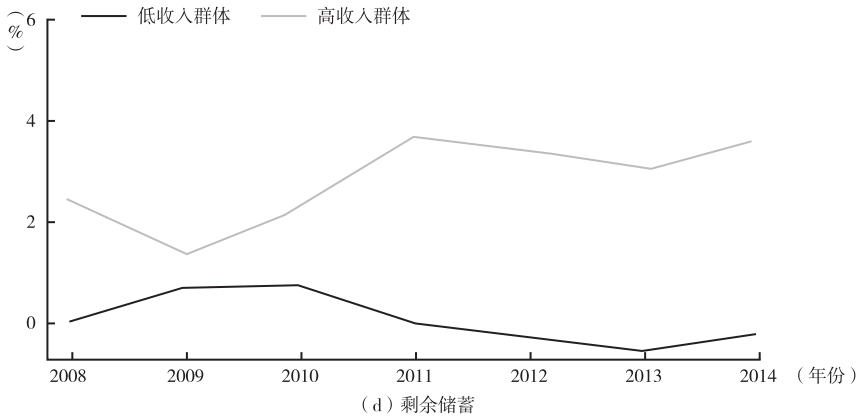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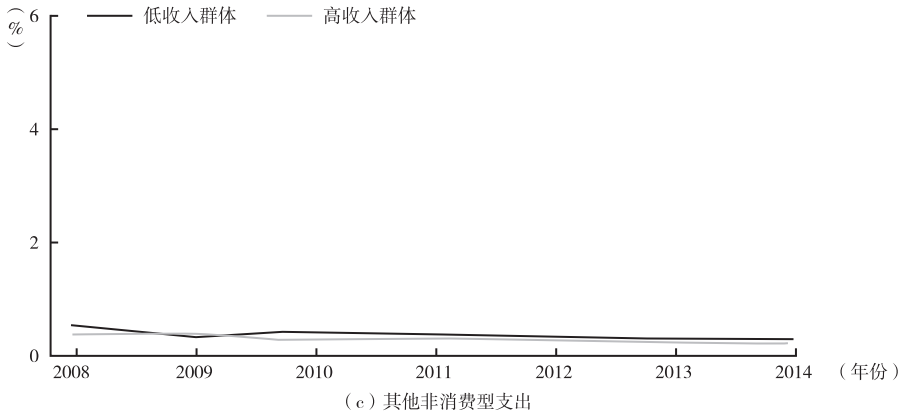


图 6 2008~2014 年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的储蓄构成

资料来源：“中国城乡流动人口”项目对城乡流动人口住户的调查，2008~2014 年。

## 城乡人口流动限制以及消费/储蓄模式

在这一部分里，我们要探讨城乡流动人口限制对城乡流动人口家庭的消费和储蓄模式将产生何种影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研究了两类制度性的限制迁移的因素：①将有“留守家庭”与“举家迁移”的城乡流动人口进行比较，探究两种人群存在的差异；②将享有社会保险和没有社会保险的城乡流动人口进行对比，探究其差异。关于第一个指标，我们将样本分成三类：①户主已婚，但其子女或配偶仍居住在农村；②户主已婚，且“举家迁移”至城市生活；③户主未婚。若流动人口住户的户主享有养老金或医疗保险，那么我们将该家庭的社会保险状况指标设为1，否则为0。

表2展示了这五种家庭类别的收入水平、消费和汇款额占收入的比重以及储蓄率[公式(1)和(2)定义两种储蓄率]。面板A~C研究了有“留守家庭”与“举家迁移”的流动人口住户的消费和储蓄模式，面板D和E比较了流动人口住户的户主有无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的情况。

表 2 不同组别城乡流动人口住户的收入、消费和储蓄情况：全样本数据

指标	人均实际 收入(元)	人均实际 消费支出 (元)	汇款占收 入的比重 (%)	储蓄率 (%)	不含汇款的 储蓄率 (%)	观察 样本数 (个)
户主未婚住户(面板A)						
2008 年	16884	10676	10.6	35.7	24.7	2175
2009 年	20231	13399	11.4	33.2	22.3	2183
2010 年	22505	15140	8.7	31.9	23.2	2249
2011 年	26279	14914	8.2	39.4	31.4	2008
2012 年	26512	15649	9.1	38.2	29.2	1756
2013 年	31553	18980	11.7	36.7	25.1	1414
2014 年	34275	20186	10.7	38.3	28.2	1187
年平均增长率	10.7	9.5				
举家迁移住户(面板B)						
2008 年	13274	8413	5.0	31.3	26.2	1037
2009 年	14621	10340	10.6	26.0	16.6	1278
2010 年	16446	10885	3.8	29.1	25.1	1380
2011 年	18155	10976	4.4	30.6	25.9	1515
2012 年	19541	11725	5.7	31.9	25.7	1673

续表

指标	人均实际 收入(元)	人均实际 消费支出 (元)	汇款占收 入的比重 (%)	储蓄率 (%)	不含汇款的 储蓄率 (%)	观察 样本数 (个)
2013 年	21447	13145	5.8	29.3	24.0	1666
2014 年	22517	13917	5.1	29.2	24.4	1824
年平均增长率	7.8	7.5				
有留守家庭住户(面板 C)						
2008 年	17298	9609	23.2	42.6	17.7	1519
2009 年	20193	11949	22.8	38.7	16.8	1520
2010 年	22633	13463	15.6	39.7	23.4	1497
2011 年	26965	13468	15.8	45.4	29.6	1444
2012 年	27275	14061	17.0	43.8	26.7	1493
2013 年	30991	15384	22.6	45.6	23.8	1252
2014 年	33605	16677	20.0	44.4	24.7	1212
年平均增长率	10	8.2				
享有社会保险(面板 D)						
2008 年	18530	11045	13.1	38.5	25.9	1094
2009 年	21205	13912	15.5	32.5	18.1	1283
2010 年	22841	14784	11.1	33.8	22.8	1511
2011 年	27439	15355	11.6	39.1	27.8	1569
2012 年	26250	14746	12.6	39.3	27.1	1830
2013 年	29369	16849	14.9	37.4	23.7	1664
2014 年	31291	17771	13.3	37.5	25.5	1578
年平均增长率	7.8	7.0				
未享有社会保险(面板 E)						
2008 年	15532	9474	14.2	36.5	21.9	3637
2009 年	17939	11568	14.7	33.2	19.6	3698
2010 年	20104	12970	9.3	33.3	24.2	3615
2011 年	22413	12340	8.8	38.2	29.9	3398
2012 年	23264	13294	9.7	36.8	27.4	3092
2013 年	26341	14979	12.5	35.8	24.7	2668
2014 年	27640	15696	10.9	35.3	25.6	2645
年平均增长率	8.6	7.5				

资料来源：“中国城乡流动人口”项目调查，2008~2014 年。

首先，比较有“留守家庭”、“举家迁移”与“户主未婚”的流动人口住户的消费与储蓄情况。在三个组别中，未婚的被调查者的收入增加最多，平均每年增幅达 10.7%。然而，对于已婚的被调查者而言，有“留守家庭”与“举家迁移”这两类城乡流动人口家庭的收入年增长率分别为 8% 和

10%。就人均收入水平而言，“举家迁移”住户的人均实际收入水平是最低的。这种现象的发生很可能是由于“举家迁移”的住户平均有3.2个家庭成员居住在城市，但是“户主未婚”住户只有1.1个，有“留守家庭”的城乡流动人口家庭平均每户有1.6个家庭成员居住在城市。因此，“举家迁移”住户的人均实际收入最低。

表2的第3列报告了不同组别的人均实际消费支出情况，并在表2的最后一行展示了该组别住户消费的年均增长率。从表2可以看出，“户主未婚”住户和“举家迁移”住户的消费年均增长率分别比各自组别住户对应的收入年均增长率低1.2%和0.3%，这说明这两类住户具有较高的消费占比以及较低储蓄率。但是，对于有“留守家庭”的住户来说，该组别的消费年均增长率比其收入年均增长率低1.8%。实际上，“户主未婚”住户和“举家迁移”住户的消费占收入的比重在2014年大约为60%；对有“留守家庭”的住户来说，这一数据仅为50%，比其他两个组别低了10%。

接下来看表2第4列，有“留守家庭”的住户汇款占收入的比重要比另两个组别的住户高10%。并且，“户主未婚”住户的汇款比重也高于“举家迁移”的住户。最后，表2第5和第6列展示了不同住户的储蓄率情况[公式(1)和(2)定义的两种储蓄率均有报告]。同样地，有“留守家庭”的住户具有最高的储蓄率，“户主未婚”住户次之，“举家迁移”住户的储蓄率水平最低。在调查的初期，对有“留守家庭”的住户而言，汇款占储蓄的比率高达60%，但这一比例逐步下降至40%~45%。对于“户主未婚”住户而言，汇款占其储蓄水平的1/3，而“举家迁移”的住户汇款占比约为15%。

从表2的面板D和E可以看出，两类住户（是否享有社会保险）的收入和消费增长率之间的差别较小。但是，与享有社会保险的住户相比，未享有社会保险的住户储蓄率[不包含汇款，即公式(2)定义的储蓄率]的增加幅度更大。这说明，近年来，流动人口住户具有较高的储蓄需求，尤其是未享有社会保险的住户。

## 家庭特征

本章也提供了一些可能与流动人口住户消费和储蓄变量相关的描述性统计量。表3的第一个部分显示了所有样本的描述性统计量，第二部分报告了

新住户样本的情况。表 3 显示，2008 年流动人口住户户主的平均年龄大约为 30 岁，且随着时间推移，户主的平均年龄有所增加。其中，大约 60% ~ 69% 的家庭户主是男性。单身流动人口的比例也随时间逐渐减少。例如，2014 年，72% 的户主已婚或已有伴侣同居。这可能是因为本章的总体样本包含了大量的面板数据，并且已婚人士在城市久居的可能性更大。当研究新样本的情况时，本章发现城乡流动人口家庭户主已婚的比例也有所增加，但其增加的幅度与总体样本不同。

表 3 流动人口住户特征的描述性统计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全部样本							
户主年龄(岁)	30.45	31.28	31.5	32.16	33.43	34.74	35.97
户主为男性(%)	69	67	66	62	62	63	62
户主已婚(%)	54	56	56	60	64	67	72
户主受教育水平为初中及以下(%)	66	63	61	63	64	63	65
户主从事自我经营工作(%)	19	22	22	24	26	29	31
流动年限(年)	7.75	8.37	8.16	9.25	10.52	11.27	12.33
家庭规模(人)	1.67	1.73	1.77	1.88	1.97	2.06	2.19
迁移儿童总数	0.49	0.59	0.58	0.68	0.71	0.76	0.79
留守儿童总数	0.80	0.72	0.64	0.63	0.62	0.58	0.57
儿童总数	1.29	1.31	1.22	1.31	1.33	1.34	1.35
不携带配偶的已婚流动人口(%)	35	33	32	30	27	26	23
有养老保险户主(%)	20	22	24	27	33	35	34
有医疗保险户主(%)	12	15	25	23	30	34	33
新住户样本							
户主年龄(岁)	30.45	30.52	30.27	30.24	31.42	32.62	34.39
户主为男性(%)	69	65	64	61	61	62	6
户主已婚(%)	54	51	48	48	55	58	63
户主受教育水平为初中及以下(%)	66	62	59	63	62	60	64
户主从事自我经营工作(%)	19	18	16	17	17	21	22
流动年限(年)	7.75	7.70	6.50	7.68	8.8	9.03	10.33
家庭规模(人)	1.67	1.58	1.54	1.60	1.73	1.70	1.89
迁移儿童总数	0.49	0.50	0.41	0.53	0.54	0.54	0.65
留守儿童总数	0.80	0.79	0.69	0.77	0.8	0.79	0.71
儿童总数	1.29	1.3	1.1	1.29	1.34	1.32	1.36
不携带配偶的已婚流动人口(%)	35	40	40	39	34	38	29
有养老保险户主(%)	20	21	19	25	35	30	29
有医疗保险户主(%)	12	15	22	19	34	30	29

资料来源：“中国城乡流动人口”项目调查，2008~2014 年。

大多数流动人口住户户主的受教育水平仅为初中及以下。在调查期间（2008~2014年），从事自我经营工作的流动人口比率有所增加，从2008年的19%增至2014年的31%。但是，这种现象只发生在所有住户样本中。对于新住户样本而言，这一比例仅略有增加，2014年仅为22%。这一现象可能是因为自我经营者在城市久居的可能性更大，更容易被追踪到。本章基于第一次外出务工的时间构建了流动年限这一变量。基于新住户样本，本章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城乡流动人口居住在城市的时间长度似乎从7~8年增加到了9~10年。由于中国城乡流动人口在第一次外出打工之后可能经常返乡，因此本章采用这一指标可能会高估他们在城里生活、工作的时间。但是，这是笔者所能找到的最合适的衡量方法。

此外，城乡流动人口住户的平均家庭规模也有所增加，从1.67人增至2.19人。这一数据显示出，“举家迁移”的比例有所上升。更重要的是，从表3的数据可以看出，留守儿童和留守配偶的比例有所下降。基于新住户样本，2008年仅有38%的住户在流动时携带了子女。2014年，这一比率增加至48%。类似的，不携带配偶的已婚流动人口的比例也下降了，从35%下降至29%。

## 对城乡流动人口消费和储蓄情况的解读

在这部分中，本章分析了影响流动人口住户消费和储蓄行为的因素。依据公式（3）进行了估计：

$$Y_{ijt} = \alpha + f[\ln(inc)_{ijt}] + \delta X_{ijt} + \gamma W_{ijt} + C_{jt} + \epsilon_{ijt} \quad (3)$$

其中， $i$ 、 $j$ 和 $t$ 分别代表家庭、城市和年份。 $Y$ 是被解释变量，分别是人均实际消费的对数和储蓄率。解释变量中， $\ln(inc)$ 是人均实际收入的对数。 $X$ 是与流动人口住户永久收入相关的家庭特征，如流动人口住户户主的受教育水平、年龄及其平方项、户主的性别及户主是否是自营工作者。考虑到本章的目的是解析人口流动的制度性约束如何影响流动人口住户的消费行为，我们未区分流动人口住户的永久性收入和临时性收入，仅仅控制了一些影响永久性收入的因素。此外， $W$ 是控制变量，代表当前的制度性约束，包括户主的婚姻状况（已婚或单身）、住户规模、住户拥有的子女数量、留

守儿童的数量、户主的配偶是否留在农村以及户主是否享有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 $C$  是城市 - 年份固定效应向量, 包含了所有可能影响住户消费的城市 - 年份层面上的不可观测因素, 如未完全被省级 CPI 所消除的价格效应。最后,  $\epsilon_{ijt}$  是随机误差项。本章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制度性约束对家庭消费和储蓄行为产生的影响 ( $\gamma$ )。 $f[\ln(\text{inc})_{ijt}]$  函数允许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考虑到我们的主要目的是研究  $\ln(\text{inc})$  以外的变量尤其是  $\gamma$  的系数, 因此首先采用参数方法对公式 (3) 进行估计, 即假设  $f[\ln(\text{inc})_{ijt}]$  函数为线性函数。在本章的其余部分, 我们使用 Yatchew (1997, 1998) 的方法, 对公式 (3) 进行了半参数方程估计, 研究收入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

## 主要结果

表 4 展示了对等式 (3) 进行参数估计的结果。A 和 B 两部分分别采用了全样本和新住户样本进行估计。被解释变量是人均实际消费的对数和储蓄率。这两个样本的估计结果是基本一致的。接下来, 本章将讨论全样本的估计结果, 以及全样本和新住户样本估计结果的差异。

平均来看, 流动人口住户消费的收入弹性为 0.61 ~ 0.68。在控制了与永久性收入挂钩的变量 ( $X$ ) 后, 储蓄的收入弹性大约为 0.21 ~ 0.25。本章使用两步回归估计来探讨消费的收入弹性。先用  $X$  来预测永久性收入, 并将残差作为临时性收入。然后, 将这两个收入变量同时带入回归方程。我们发现永久性收入的系数为 0.91, 而临时性收入的系数是 0.58, 这与表 4 的结果类似。由于城乡流动人口收入较低, 他们很有可能消费大部分临时性收入。

流动人口住户户主的年龄与其消费之间呈现“倒 U 形”曲线关系 (即消费水平先增加后下降), 而户主的教育水平与是否从事自我经营均与消费呈现正相关关系 (与储蓄呈现负向相关关系)。总体来看, 户主为男性的住户具有较低的消费倾向和较高的储蓄倾向。

户主的流动年限与消费也呈现“倒 U 形”, 但是流动年限到 36 年才会出现消费水平的拐点 (见图 7)。因此, 在流动年限未到 36 年时, 随着流动年限的增加, 城乡流动人口家庭的消费水平将逐年提高。这很可能是由于流动人口的消费行为逐渐被城市同化。如上文所述, 由于一些制度性约束

表 4 回归结果：消费和储蓄

回归组	面板 A：全样本			面板 B：新住户样本		
	人均实际 消费(对数)	排除保险支出的 人均实际消费 (对数)	储蓄率	人均实际 消费(对数)	排除保险支出的 人均实际消费 (对数)	储蓄率
E 变量	0.608 <sup>***</sup> [0.006]	0.605 <sup>***</sup> [0.006]	0.252 <sup>***</sup> [0.004]	0.679 <sup>***</sup> [0.008]	0.677 <sup>***</sup> [0.008]	0.209 <sup>***</sup> [0.005]
	-0.000 [0.002]	-0.001 [0.002]	0.000 [0.001]	0.000 [0.002]	0.000 [0.002]	-0.001 [0.001]
户主年龄	-0.000 <sup>**</sup> [0.000]	-0.000 <sup>**</sup> [0.000]	0.000 <sup>**</sup> [0.000]	-0.000 <sup>**</sup> [0.000]	-0.000 <sup>**</sup> [0.000]	0.000 <sup>**</sup> [0.000]
	-0.036 <sup>***</sup> [0.005]	-0.035 <sup>***</sup> [0.005]	0.019 <sup>***</sup> [0.003]	-0.025 <sup>***</sup> [0.006]	-0.024 <sup>***</sup> [0.006]	0.014 <sup>***</sup> [0.004]
户主受教育水平	0.012 <sup>***</sup> [0.001]	0.012 <sup>***</sup> [0.001]	-0.008 <sup>***</sup> [0.001]	0.011 <sup>***</sup> [0.001]	0.011 <sup>***</sup> [0.001]	-0.006 <sup>***</sup> [0.001]
	0.186 <sup>***</sup> [0.006]	0.182 <sup>***</sup> [0.006]	-0.113 <sup>***</sup> [0.004]	0.176 <sup>***</sup> [0.009]	0.174 <sup>***</sup> [0.009]	-0.108 <sup>***</sup> [0.006]
户主是否从事自我经营	0.005 <sup>***</sup> [0.001]	0.005 <sup>***</sup> [0.001]	-0.003 <sup>***</sup> [0.001]	0.006 <sup>***</sup> [0.001]	0.006 <sup>***</sup> [0.001]	-0.004 <sup>***</sup> [0.001]
	-0.000 <sup>***</sup> [0.000]	-0.000 <sup>***</sup> [0.000]	-0.000 <sup>***</sup> [0.000]	-0.000 <sup>***</sup> [0.000]	-0.000 <sup>***</sup> [0.000]	-0.000 <sup>***</sup> [0.000]
流动年限	-0.052 <sup>***</sup> [0.004]	-0.053 <sup>***</sup> [0.004]	0.035 <sup>***</sup> [0.003]	-0.025 <sup>***</sup> [0.006]	-0.027 <sup>***</sup> [0.006]	0.018 <sup>***</sup> [0.004]
	-0.069 <sup>***</sup> [0.009]	-0.069 <sup>***</sup> [0.009]	0.029 <sup>***</sup> [0.005]	-0.071 <sup>***</sup> [0.012]	-0.071 <sup>***</sup> [0.012]	0.031 <sup>***</sup> [0.007]

续表

回归组	面板 A: 全样本			面板 B: 新住户样本		
	人均实际 消费(对数)	排除保险支出的 人均实际消费 (对数)	储蓄率	人均实际 消费(对数)	排除保险支出的 人均实际消费 (对数)	储蓄率
儿童总数	0.056 <sup>***</sup>	0.055 <sup>***</sup>	-0.038 <sup>***</sup>	0.054 <sup>***</sup>	0.055 <sup>***</sup>	-0.038 <sup>***</sup>
	[0.006]	[0.006]	[0.004]	[0.009]	[0.009]	[0.006]
留守儿童总数	-0.106 <sup>***</sup>	-0.106 <sup>***</sup>	0.064 <sup>***</sup>	-0.100 <sup>***</sup>	-0.102 <sup>***</sup>	0.062 <sup>***</sup>
	[0.006]	[0.006]	[0.004]	[0.010]	[0.010]	[0.006]
留守配偶虚拟变量	-0.053 <sup>***</sup>	-0.053 <sup>***</sup>	0.018 <sup>***</sup>	-0.053 <sup>***</sup>	-0.054 <sup>***</sup>	0.019 <sup>**</sup>
	[0.009]	[0.009]	[0.005]	[0.012]	[0.012]	[0.007]
有养老保险的户主	0.023 <sup>***</sup>	0.017 <sup>**</sup>	-0.011 <sup>***</sup>	0.024 <sup>**</sup>	0.020 <sup>**</sup>	-0.012 <sup>**</sup>
	[0.007]	[0.007]	[0.004]	[0.009]	[0.009]	[0.006]
有医疗保险的户主	0.052 <sup>***</sup>	0.041 <sup>***</sup>	-0.030 <sup>***</sup>	0.049 <sup>***</sup>	0.043 <sup>***</sup>	-0.027 <sup>***</sup>
	[0.007]	[0.007]	[0.005]	[0.010]	[0.010]	[0.006]
新住户样本虚拟变量	0.000	0.002	0.000			
	[0.005]	[0.005]	[0.003]			
城市 -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33282	33282	33282	17526	17526	17526
R - squared	0.483	0.478	0.236	0.502	0.500	0.209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水平上显著。回归中包含表示流动年限和自我经营是否缺失的虚拟变量。括号内的数据表示标准误差。数据来源于 2008 ~ 2014 年“中国城乡流动人口”项目。

的存在，流动人口在城市永久居住的可能性较低。基于本章的数据，流动人口在城市居住年限的中位数为 8 年，平均值为 11 年左右。这两个数据均低于 36 年，因此流动人口的消费水平离拐点尚远。从这一点来看，人口流动的制度性约束限制了流动人口在城市的消费水平。鉴于城市中流动人口的规模以及城市和农村地区个人的消费水平差异（见表 1 和表 2），流动人口无法长期居住在城市，这将显著地降低城市总体消费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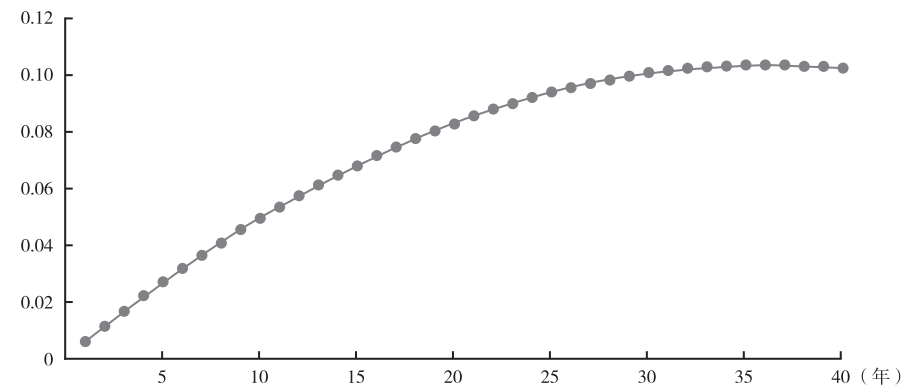


图 7 流动年限和消费水平

资料来源：基于表 4 的估计结果。

家庭规模与人均消费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这可能是因为规模大的家庭在人均公共物品上的花费较少。在家庭规模一定的情况下，已婚户主无论是否携带配偶，其花费均小于单身户主。这可能是因为已婚家庭更倾向于考虑未来。子女较多的住户消费较多，然而在子女数量一定的情况下，有留守儿童的住户消费更少、储蓄更多。平均来说，每增加一个留守儿童，居住在城市流动人口住户的人均消费额将减少 5%（ $10.6\% - 5.6\%$ ）。类似地，对于已婚且未携带配偶的流动人口而言，他们的人均消费水平下降了 12.2%（ $6.9\% + 5.3\%$ ）。可以清楚地看出，针对流动人口的制度性约束对其消费和储蓄行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同样地，户主是否有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同样也与他们的消费模式相关。由于一些保险的支出已被包括在消费的衡量中了，因此有保险的住户的消费模式很可能受变量构建影响。为了验证这一可能性，我们计算了排除保险支出后的人均消费水平，并且重新进行了一次回归（每个部分的第二

列)，但结果基本上是一致的。这说明了有社会保险的居民对未来的担心更少，因此愿意花更多的钱。换句话说，没有社会保险的人是出于预防谨慎性动机才多储蓄的。根据表4的结果，如果一个住户的户主没有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这个住户的人均消费就会降低6%~8%。

为了探究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储蓄）倾向的差异，本章采用半参数方程法对公式（3）进行了估计。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控制了所有与家庭永久性收入相关的变量、制度性人口流动约束的相关变量以及城市-年份固定效应，结果展示在图8中。图8（a）呈现了城乡流动人口家庭消费和收入的总体关系，该结果与图3展示的估计结果是一致的，即随着时间的推移，城乡流动人口家庭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曲线变得更加平缓。这种现象的发生是因为低收入群体在城乡流动人口初期的消费水平较低，储蓄水平较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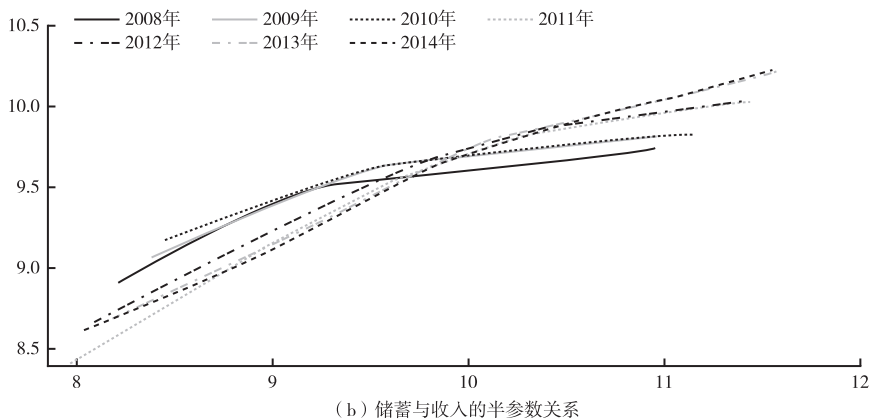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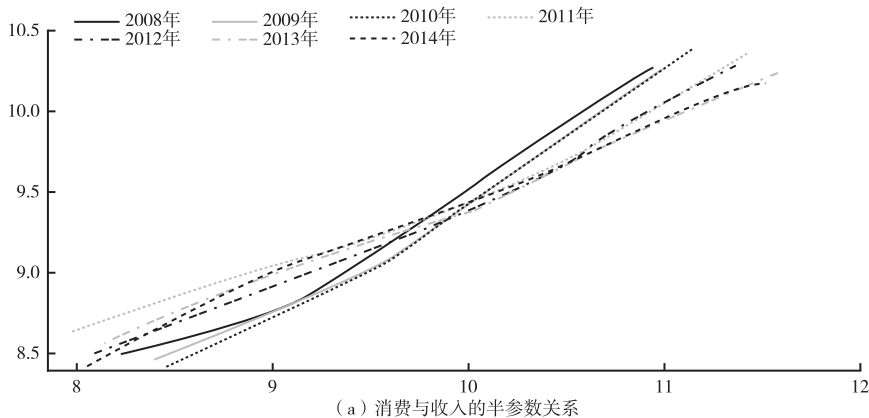


图8 消费、储蓄与收入之间的半参数关系

资料来源：依据公式（3）进行半参数估计。

最后，本章采用公式（3）对高收入群体（收入前 20%）和低收入群体（收入后 20%）分别进行了估计（见表 5）。我们发现，与高收入群体相比，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对消费影响较小：收入上涨 10% 会导致低收入群体消费上升 4.7%，高收入群体的消费上涨 6.9%。自然地，收入对两类群体储蓄的影响有着相反的结果：收入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将大于其对高收入群体的影响。具体来说，低收入家庭的边际储蓄倾向是 0.44，但是高收入家庭的边际储蓄倾向是 0.14。这些结果与图 3 展示的结论是吻合的。从图 3 可以看出，对高收入群体而言，储蓄与收入的关系曲线更加平缓。此外，对人口流动的制度性约束估计的结果与对全样本估计的结果非常相似。并且，我们发现相对于低收入群体，留守儿童对高收入群体的影响较大。社会保险变量对这两个群体的影响基本一致。但是，由于低收入群体的社保覆盖率仅是高收入群体的一半，因此提高城市消费水平的有效方法是提高低收入流动人口的社保覆盖率。但值得注意的是，公式（3）仅包含了两个社保变量，其他社保变量可能是低收入群体边际储蓄倾向比高收入群体高的原因<sup>①</sup>。

表 5 消费和储蓄：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

指标	人均实际消费(对数)		储蓄率	
	低收入群体	高收入群体	低收入群体	高收入群体
人均实际收入(对数)	0.474 ***	0.688 ***	0.443 ***	0.140 ***
	[0.016]	[0.024]	[0.014]	[0.012]
户主年龄	0.002	-0.004	-0.000	0.003
	[0.003]	[0.005]	[0.002]	[0.003]
户主年龄平方项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户主为男性	-0.017 *	-0.075 ***	0.016 ***	0.038 ***
	[0.009]	[0.012]	[0.007]	[0.006]
户主受教育水平	0.008 ***	0.014 ***	-0.007 ***	0.007 ***
	[0.002]	[0.002]	[0.001]	[0.001]
户主是否从事自我经营	0.126 ***	0.201 ***	-0.098 ***	0.095 ***
	[0.010]	[0.015]	[0.008]	[0.008]

① 通常社保变量之间是高度相关的，如果估计模型中同时包含所有社保变量，则会产生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续表

	人均实际消费(对数)		储蓄率	
	低收入群体	高收入群体	低收入群体	高收入群体
流动年限	0.004 *	0.004	-0.003 *	-0.002
	[0.002]	[0.003]	[0.002]	[0.001]
流动年限平方项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家庭规模	-0.042 ***	-0.122 ***	0.038 ***	0.058 ***
	[0.006]	[0.013]	[0.005]	[0.006]
户主已婚	-0.063 ***	-0.072 ***	0.024	0.035 ***
	[0.023]	[0.018]	[0.017]	[0.009]
儿童总数	0.033 ***	0.047 ***	-0.025 ***	-0.022 **
	[0.008]	[0.020]	[0.007]	[0.010]
留守儿童总数	-0.086 ***	-0.098 ***	0.084 ***	0.045 ***
	[0.011]	[0.019]	[0.009]	[0.010]
留守配偶虚拟变量	-0.089 ***	-0.090 ***	0.040 ***	0.037 ***
	[0.020]	[0.022]	[0.015]	[0.011]
有养老保险的户主	0.014	0.007	-0.010	-0.002
	[0.015]	[0.015]	[0.012]	[0.008]
有医疗保险的户主	0.043 ***	0.046 ***	-0.024 *	-0.022 ***
	[0.016]	[0.016]	[0.013]	[0.008]
新住户样本虚拟变量	0.041 ***	0.003	-0.026 ***	0.000
	[0.011]	[0.012]	[0.008]	[0.006]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6705	6478	6706	6478
R-squared	0.398	0.304	0.254	0.216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水平上显著。回归中包含表示流动年限和自我经营是否缺失的虚拟变量。括号内的数据表示标准误。数据来源于 2008～2014 年“中国城乡流动人口”项目。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对人口流动的制度性约束将通过多种渠道对流动人口的城市消费产生负影响。这些渠道包括：一是流动人口在城市定居的时间变短；二是流动人口在城市不能平等地享受城市提供的公共服务，导致其子女及其他家庭成员留守农村；三是流动人口无法享有城市提供的社会保障，从而增加了预防性储蓄等。

## 储蓄和汇款

以上分析基于城乡流动人口在城市的消费、储蓄（含汇款）。虽然如果流动人口享有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他们会消费得更多，但是他们的部分储蓄——也就是汇款——会在农村地区消费。因此，这种类型的消费减少不一定会减少国内的总体需求。例如，有子女留守在农村的流动人口在城市消费得少是因为他们需要将钱汇给家里的子女，这些钱最终还是会在农村消费。

这里，有三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第一，正如图1和图2所示，平均来说，人们在城市比在农村消费得多。因此，如果那些留守在农村的家庭成员被带到城市的话，他们会消费更多。第二，Zhu等（2012）使用两个农业大省的1500个住户的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的结果表明，汇款中的边际储蓄倾向超过了0.9，这一倾向非常高，即使使用IV估计方法，这一倾向也只在0.3~0.6<sup>①</sup>。第三，制度对人口流动的约束只影响城市消费还是影响总消费，这是一个实证问题。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本章通过储蓄的子分类来研究储蓄模式，包括投资、汇款、剩余储蓄（存款和现金储蓄的增量）和汇款以外的总体储蓄。前两个种类加上其他非消费支出构成了总体的非消费支出。剩余储蓄是由收入减去消费支出和非消费支出得到的。

由于许多住户的消费并不涉及非消费支出的所有子项目，并且很多住户的储蓄构成中有负值，所以这些变量中有很多值为零或者为负。本章首先根据这些变量的分布情况来决定它们的估计方法。在本章的调查数据中，只有12%的观测样本拥有投资储蓄。因此本章使用线性概率模型来探究拥有投资储蓄的相关特征属性（因变量是一个虚拟变量，观测样本拥有投资储蓄取1，否则取0）。对于汇款变量来说，大约40%的观测样本值为负值或者零，对于存款和持有的现金来说，约22%的观测样本值为负值。关于这些变量，已有文献通常采用反双曲正弦的变化方法使这些变量的分布偏度变小，然后再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Carroll et al., 2003; Cobb-Clark, Hildebrand, 2006; Meng, 2007）。因此，将汇款和存款 - 现金作为因变量，公式（3）可以被写成：

---

① 但是他们的研究中的IV的可靠性以及估计方法存在争议。

$$g(Y_{ijt}) = \tilde{\alpha} + \tilde{\beta} \ln(inc)_{ijt} + \tilde{\delta} X_{ijt} + \tilde{\gamma} W_{ijt} + \tilde{c}_{ijt} + \tilde{\epsilon}_{ijt} \quad (4)$$

反双曲正弦转变法的定义：

$$g(Y_{ijt}) = \sinh^{-1}(\theta Y_{ijt})/\theta = \ln[\theta Y_{ijt} + (\theta^2 Y_{ijt}^2 + 1)^{1/2}]/\theta \quad (5)$$

在公式(5)中,  $\theta$  是一个阻尼参数<sup>①</sup>。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结果,本章计算了每个变量的边际效应,计算方法是建立在以下公式的基础上的。例如,要想计算  $X$  对  $Y$  的边际效应,我们需要计算  $Y/\partial X = \tilde{\beta} [(\theta Y)^2 + 1]^{1/2}$ , 其中第一项是估计出的系数,第二项是  $\partial Y/\partial g(Y_{ijt})$ 。

表6报告了关于投资、汇款、剩余储蓄率以及汇款以外的储蓄率的估计结果。第(1)列展示了家庭拥有投资的概率。我们发现收入每增加1%,家庭拥有投资的概率将上涨0.074%。但是家庭户主从事自我经营的要比不从事自我经营的投资概率大14.5%,这也是投资公式的最大值。有子女或者配偶留守农村的家庭投资概率会下降,但是我们只精确计算了子女留守情况下的系数。户主有养老保险或是健康保险的住户要比没有这些社会保障的住户投资概率大。

表6 储蓄子项目的回归结果

指标	投资系数	汇款系数 (ME at mean)		剩余储蓄率系数 (ME at mean)		不包含汇款的 储蓄率系数
	(1)	(2)	(3)	(4)	(5)	(6)
人均实际收入(对数)	0.074 ***	479.273 ***	1394.89	0.236 ***	0.241	0.263 ***
	[0.005]		[13.784]		[0.005]	[0.005]
户主年龄	0.002 *	9.599 *	27.94	-0.003 **	-0.003	-0.002 *
	[0.001]		[4.924]		[0.001]	[0.001]
户主年龄平方项	-0.000	-0.131 **	-0.38	0.000 ***	0.000	0.000 ***
	[0.000]		[0.065]		[0.000]	[0.000]
户主为男性	-0.003	84.378 ***	245.58	0.004	0.004	0.005
	[0.004]		[11.469]		[0.004]	[0.003]
户主受教育水平	0.002 **	-4.508 **	-13.12	-0.008 ***	-0.008	-0.008 ***
	[0.001]		[2.027]		[0.001]	[0.001]

① 在本章中,笔者对汇款取  $\theta=0.001$ ,对剩余储蓄率取  $\theta=1.2$ ,从而使残差接近正态分布。

续表

指标	投资系数	汇款系数 (ME at mean)		剩余储蓄率系数 (ME at mean)		不含汇款的 储蓄率系数
	(1)	(2)	(3)	(4)	(5)	(6)
户主是否从事自我经营	0.145 *** [ 0.008 ]	-118.289 ***	-338.45 [ 14.384 ]	-0.132 ***	-0.135 [ 0.005 ]	-0.097 *** [ 0.005 ]
流动年限	0.001 [ 0.001 ]	12.510 ***	38.41 [ 3.273 ]	-0.005 ***	-0.005 [ 0.001 ]	-0.005 *** [ 0.001 ]
流动年限平方项	-0.000 [ 0.000 ]	-0.299 ***	-0.87 [ 0.108 ]	0.000 ***	0.000 [ 0.000 ]	0.000 *** [ 0.000 ]
家庭规模	0.030 *** [ 0.004 ]	-188.214 ***	-483.75 [ 8.121 ]	0.051 ***	0.052 [ 0.004 ]	0.081 *** [ 0.003 ]
户主已婚	0.008 [ 0.008 ]	295.939 ***	881.31 [ 22.809 ]	-0.031 ***	-0.032 [ 0.006 ]	-0.025 *** [ 0.008 ]
子女数量	0.009 * [ 0.005 ]	81.176 ***	238.28 [ 12.701 ]	-0.052 ***	-0.053 [ 0.005 ]	-0.048 *** [ 0.005 ]
留守儿童总数	-0.011 * [ 0.008 ]	374.708 ***	1090.55 [ 14.897 ]	0.011 **	0.011 [ 0.005 ]	0.004 [ 0.005 ]
留守配偶虚拟变量	-0.010 [ 0.007 ]	273.430 ***	795.80 [ 20.578 ]	-0.053 ***	-0.055 [ 0.007 ]	0.050 *** [ 0.008 ]
有养老保险的户主	0.012 ** [ 0.008 ]	20.011	58.24 [ 18.075 ]	-0.020 ***	-0.020 [ 0.008 ]	-0.010 *** [ 0.005 ]
有医疗保险的户主	0.034 *** [ 0.008 ]	-27.825	-80.40 [ 19.199 ]	-0.029 ***	-0.030 [ 0.008 ]	-0.028 *** [ 0.005 ]
新住户样本虚拟变量	-0.023 *** [ 0.004 ]	-108.793 ***	-310.81 [ 13.841 ]	0.030 ***	0.031 [ 0.004 ]	0.022 *** [ 0.004 ]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33.282	33.282		33.282		33.282
R-squared	0.110	0.279		0.167		0.170

注：\*\*\* \*\* \* 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回归中包含表示“流动年限”和自我经营是否缺失的虚拟变量。括号内的数据表示标准误。数据来源于2008~2014年“中国城乡流动人口”项目。

表6的回归结果表明，流动人口住户收入上涨1%会导致其汇款增加14元人民币[见表6第(2)、(3)列]。综合来看，住户特征对汇款产生的影响最大。第一，流动人口的婚姻状态与汇款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已婚者比单身者的汇款多861元人民币。第二，对于已婚且有子女的流动人口而言，每

多一个子女会导致其汇款增加 238 元人民币。此外，有留守子女的流动人口汇款更多。每增加一个留守子女，流动人口的汇款将增加 1091 元人民币。并且，与已婚且携带配偶的流动人口比较，未携带配偶的流动人口汇款多 796 元人民币。因此，如果某外来务工者是已婚且有留守配偶和一个留守子女，那么其汇款将会比单身外来务工者多出 2986 元人民币（ $861 + 238 + 1091 + 796$ ）。这个数字非常大，几乎是全样本中人均实际汇款额平均值的 1.1 倍，也是 2014 年人均汇款额平均值的 86%。通过前文的分析，留守家庭的流动人口具有较多的汇款。与之相反的是，流动人口住户在城里每增加一个家庭成员，该住户的汇款额将减少 484 元人民币。从流动人口的工作性质来看，自我经营者的汇款较少，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要在城市进行投资[见表 6 第 (1) 列]。

表 6 的第 (4) 列和第 (5) 列报告了剩余储蓄率  $[(收入 - 消费 - 非消费支出) / 收入]$  的回归结果。2008~2014 年，流动人口住户的剩余储蓄率平均约为 19%。回归结果表明，除户主性别以外的大多数变量对剩余储蓄率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并且影响系数符号是合理的。具体而言，户主年龄与剩余储蓄率呈现“U 形”关系，其教育水平与剩余储蓄率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自我经营的户主更倾向于投资，因而其剩余储蓄（存款或持有现金）较少。享有社会保险的住户更加倾向于投资，其剩余储蓄和汇款较少。例如，表 6 的第 (4) 列和第 (5) 列的估计结果显示，如果户主未享有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则该家庭的剩余储蓄率将比有这两种保险的住户高出 4.9 个百分点（平均剩余储蓄率的 26%）。值得注意的是，保险的影响主要来自医疗保险。未享有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的住户将增加其储蓄，且大多数储蓄以存款和现金的形式存在，以达到预防的目的。表 6 的回归结果表明，一些反映住户家庭特征的虚拟变量：户主的婚姻状况、子女数量、配偶是否留守等均与剩余储蓄率呈现负相关关系。然而，是否有留守子女与剩余储蓄率呈现正相关关系，但相关性较小。平均来说，每增加 1 个留守子女将会使剩余储蓄率增加一个百分点（平均剩余储蓄率的 5%）。为什么有留守子女的流动人口具有较高的剩余储蓄率？这一问题很复杂，可能是因为只有存有足够的储蓄流动人口才有能力把子女带进城并承担子女在城市居住的生活开支。因此，有留守子女的住户比其他住户具有更高的剩余储蓄率。在 2013 年和 2014 年的“中国城乡流动人口”项目调查中，笔者询问了影响流动人口在

城市永久居住的最重要的因素。大约 36%（最高的比例）的流动人口认为子女在城市上幼儿园、上学不收或少收费是最重要的。这一数据说明了为子女教育而进行储蓄对流动人口的重要性。

最后，表 6 的第（6）列报告了以排除汇款后的储蓄率 [公式（2）的定义] 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第（6）列的回归结果和第（4）列和第（5）列的结果基本一致。

因此，总体来说，有留守家庭的流动人口住户给农村老家寄了很多钱。虽然 Zhu 等（2012）指出有留守家庭的流动人口的汇款储蓄率很高，但是本章使用的样本无法验证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探讨也超出了本章的研究目的。基于本章得到的结果，我们可以指出的是，有留守家庭的流动人口住户在城里消费较少、储蓄较多，并且在城里投资的概率较低，尤其是有留守子女的住户存了更多的钱。并且，由于流动人口缺少社会保险的保障，他们减少了投资并增加了现金储蓄。

## 结 论

中国未来的发展将非常倚重国内需求，国内需求的扩张又会受城市化进程的影响。中国当前的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口的流动，这些限制人口流动的制度也阻碍了中国从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向国内需求导向的发展模式转变。

在本章中，笔者使用了“中国城乡流动人口”项目的 7 年调查数据来证明这些制度约束是如何直接降低了 1.66 亿流动人口的消费水平。在这些流动人口中，有留守家庭的流动人口数量比举家迁移的流动人口要少得多。更重要的是，没有社会保险的流动人口有很强的预防谨慎性动机。考虑到 2014 年只有不到 35% 的户主拥有医疗保险或者养老保险，如果解决了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险问题，那么国内需求将会显著增加。

在流动人口中，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险覆盖率尤低。2014 年，收入排名后 20% 住户的社会保险覆盖水平仅仅是收入排名前 20% 住户的一半左右。我们也发现低收入群体的边际储蓄倾向要比高收入住户高得多，低收入群体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较高。因此，在低收入流动人口中普及社会保险将对消费产生重大影响。

## 参考文献

- Cai, F., Giles, J., O’Keefe, P. and Wang, D. (2012), *The elderly and old age support in rural China*,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 Carroll, C. D., Dynan, K. E. and Krane, S. D. (2003), Unemployment risk and precautionary wealth: Evidence from households’ balance sheet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5(3): 586–604.
- Chamon, M., Liu, K. and Prasad, E. (2013), Income uncertainty and household savings i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05: 164–177.
- Chen, Y. and Feng, S. (2013), Access to public schools and the educa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6: 75–88.
- Choi, H., Lugauer, S. and Mark, N. C. (2014), *Precautionary saving of Chinese and US households*, NBER Working Paper 20527, September, Cambridge, Mas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Cobb-Clark, D. A. and Hildebrand, V. A. (2006), The wealth and asset holdings of US-born and foreign-born households: Evidence from SIPP data,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52(1): 17–42.
- Du, Y., Gregory, R. and Meng, X. (2006), The impact of the guest-worker system on poverty and the wellbeing of migrant workers in urban China, in R. Garnaut and L. Song (eds), *The turning point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Canberra: ANU E Press.
- Gong, X., Kong, S., Li S. and Meng, X. (2008), Rural–urban migrants: A driving force for growth, in L. Song and W. Woo (eds), *China’s Dilemma*, Canberra: ANU E Press.
- Meng, X. (2003), Unemployment, consumption smoothing, and precautionary saving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1(3): 465–485.
- Meng, X. (2007), Wealth accumulation and distribution in urban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5(4): 761–791.
- Meng, X. (2013), Rural–urban migration: Trend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2008–2012), in R. Garnaut, F. Cai and L. Song (eds), *China: A new model for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anberra: ANU E Press.
-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various years), ‘Consumer Price Indices’,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Available from: [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 Wei, S.-J. and Zhang, X. (2011), The competitive saving motive: Evidence from rising sex ratios and savings rates in Chin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9(3): 511–564.
- Yatchew, A. (1997), An elementary estimator of the partial linear model, *Economics Letters*, 57(2): 135–143.
- Yatchew, A. (1998), Nonparametric regression techniques in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6(2): 669–721.
- Zhu, Y., Wu, Z., Wang, M., Du, Y. and Cai, F. (2012), Do migrants really save more?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remittances on savings in rural China,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8(5): 654–672.

## 附录

附表 1 流动人口住户的收入和支出情况：新住户数据

指标	人均实际 收入(元)	人均实际 消费支出 (元)	人均实际 非消费型 支出(元)	人均实际 汇款(元)	储蓄率 (%)	不含 汇款的 储蓄率 (%)	观察 样本数 (个)
2008 年	16225.42	9837.508	3411.86	2266.32	37	22	4.731
2009 年	19000.90	12183.36	3669.57	2675.58	34	21	3268
2010 年	21619.83	14184.54	2879.3	2021.38	32	23	2732
2011 年	24531.56	13362.47	3375.64	2294.48	39	30	2144
2012 年	25050.38	13787.52	3056.88	2195.42	39	31	1742
2013 年	28943.50	16388.13	5353.05	4147.01	37	24	1453
2014 年	29726.80	16278.42	4593.63	3769.61	38	27	1456
年均增长率	9	7.5	4.3	7.5			
人均实际收入排名前 20% 群体							
2008 年	29218.17	16533.60	5476.37	3675.41	43	30	
2009 年	32531.97	20227.77	7564.03	5356.82	37	21	
2010 年	37387.77	24048.33	4646.83	3208.73	35	26	
2011 年	42070.16	19361.46	6045.42	3995.87	53	43	
2012 年	41974.11	19524.46	4419.41	3276.06	52	44	
2013 年	48222.10	22274.89	11031.6	8482.42	53	35	
2014 年	50506.49	22122.55	8694.94	7476.69	55	40	
年均增长率	8.1	4.2	6.8	10.7			
人均实际收入排名后 20% 群体							
2008 年	7846.04	5595.98	2075.09	1104.80	26	13	
2009 年	9397.13	6909.44	1242.66	851.379	25	16	
2010 年	9894.18	7644.64	1251.12	823.272	21	13	
2011 年	10458.27	8930.17	1417.30	703.143	10	03	
2012 年	11241.73	9516.81	1787.61	727.825	12	05	
2013 年	12140.89	11416.75	1550.31	998.772	3	-4	
2014 年	12564.55	10458.46	1322.49	745.757	14	8	
年均增长率	7	9	-6	-5			

资料来源：2008～2014 年“中国城乡流动人口”项目调查。

(李乔迁 译)